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92

九章集

上

[古罗马] 普罗提诺 著

应明 崔峰 译

THE
ENNEADS



上海三联书店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92

九章集

上

[古罗马] 普罗提诺 著

应明 崔峰 译

THE
ENNEADS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编委会主任 陈启甸

主 编 陈 恒 黄 韬

编 委 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王 旭	王晋新	王晓德
王海利	王晴佳	卢汉超	刘 昶
刘北成	刘津渝	刘新成	向 荣
江晓原	宋立宏	张绪山	张 强
李剑鸣	杨巨平	杨熙楠	汪民安
范景中	陈 新	陈仲丹	陈志强
陈 淳	林子淳	林在勇	金寿福
侯建新	查常平	俞金尧	贺照田
赵立行	夏可君	徐晓旭	晏绍祥
高 毅	郭小凌	郭长刚	钱乘旦
黄 洋	彭 刚	彭小瑜	韩东育
魏楚雄			

本书根据史蒂芬·麦肯纳和塞缪尔·佩吉的英译本译出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总序

陈恒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以求能开阔视野,迸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

往日渐增强,合格的学术翻译队伍也日益扩大,同时我们也深信,学术垃圾的泛滥只是当今学术生产面相之一隅,高质量、原创作的学术著作也在当今的学术中坚和默坐书斋的读书种子中不断产生。然囿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也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比如国内还鲜有把国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论文系统地引介到学术界)。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将从译介西学成果、推出原创精品、整理已有典籍三方面展开。译介西学成果拟从西方近现代经典(自文艺复兴以来,但以二战前后的西学著作为主)、西方古代经典(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原典)两方面着手;原创精品取“汉语思想系列”为范畴,不断向学术界推出汉语世界精品力作;整理已有典籍则以民国时期的翻译著作为主。现阶段我们拟从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着手,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学术宝库进行挖掘,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以求为21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厦添一砖一瓦。

前 言

幸运的普罗提诺

阮 炜

无论普罗提诺身后藉奥古斯丁对基督教神学产生了多么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个“爱智者”或“哲学家”，他在世时便拥有众多门生信徒，其中最重要最著名者是波菲利。学生传承老师的思想，包括做文字编纂工作，并非新奇之事，古今中外司空见惯，但是像波菲利那样对老师的思想、人格如此景仰，以至于把他拔升到神的高度，则不多见：

良善仁慈，无与伦比的温厚动人：神谕描述他如是，而我们认为他果然如是。阿波罗说，他警觉醒悟，灵魂纯洁，永远奋力追求他以他的全部生命去爱的神圣者，他全力以赴地努力解放自己，超脱此生的血海恶涛；这就是为什么面向普罗提诺——神一般的人，通过冥思和柏拉图在《会饮》中教导的方法，他把自己提升到那最初的，也是超验于一切的神的高度——神显现了；他无形无相，却坐在王位上，超越元智和全部智觉界域。

回头看,没有波菲利对老师思想的完全服膺,对其著述尽心尽力的编纂、注疏及撰写提要,就不会有今人知道的《九章集》,甚至他那散布在几十篇文章里的思想在时间中飘零、佚失也未可知。如此这般,基督教思想史就得重写了。有波菲利这个门徒,普罗提诺是幸运的。

这里涉及一个问题:今天人们应如何看待普罗提诺的思想,直而言之,究竟将之视为一种“神学”,还是“哲学”?除了极少数有神学背景者可能愿意把它看作神学以外,我们现代人中的大多数,包括《九章集》的汉语译者和编者在内,恐怕都会倾向于将之视为“哲学”。因为非如此,我们会觉得不妥,甚至会觉得不足以彰显作者思想的重要性,也不足以肯定我们所做学术工作的恰当性。而把它视为神学妥当否?恐怕也未必,考虑到西语“神学”即 *theology* 主要是指论证及护卫三大亚伯拉罕宗教教义的学问,就更其如此了。事实上,今天所谓哲学、神学都是晚于 *philosophia* 兴起的概念,在基督教取得统治地位前的古代世界,都可能被置于 *philosophia* 的范畴。两者都兼有现代哲学和神学的内涵,都试图回答诸如万物的本原、灵魂、生死、命运、善恶、人性等通常被视为宗教的问题,¹若实在要译成“哲学”也并非不可,只是此“哲学”非彼哲学也。

不同于西方现代知识人中盛行唯物主义、无神论、不可知论的是,西方古代知识人,包括重要“哲学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在内,都持这种预设,即有一种超自然存在充当宇宙万物的本原乃至主宰。至于这种超自然存在、万物之本原乃至主宰是否具有人类的形貌,他们并没有给出基督教式的答案,而是倾向于认为,神并不具有人格,至少不会有人类身上的毛病和缺点。柏拉图甚至提出了理念神的概念。普罗提诺将之发挥后,形成了基于太一、元智和元魂三本体的庞大精密的思想体系,藉以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之类的根本性问题(比之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干骨架,普罗提诺的形上学

¹ 参见阮炜,“*Philosophia*: 哲学抑或神学?”,《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1期。

竟如此血肉丰满)。这里已禁不住把“形上学体系”这一现代哲学概念强加给普罗提诺了,只是读他的文字,更可能得出他是神学家而非哲学家的印象。在他之前,无论苏格拉底、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等,都没能像他那样用充满激情,同时思路清晰、逻辑严密的文字,如泣如诉地倾说那些根本性的论题,这也是为什么读普罗提诺,用心的读者会发现神圣感无处不在,并会被这神圣感深深打动。职是故,完全可以把《九章集》视为一部类似于《圣经》的圣书,一种指导人们生活实践的生命学问。普罗提诺既然径直把太一称作神,我们未尝不可将其思想视为一种神学?只是,此神学非彼神学亦即基督教式的神学,尽管是合成这种神学的重要材料,甚至就是基督教神学的前身。

普罗提诺固然给基督教神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不小的程度上,也正是藉着基督教神学,其著作才得以古代条件下顺利传承。然而,普罗提诺思想自有其本身的价值,不是只因傍上了基督教神学才得以流布。他本来就是柏拉图以降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其生命形上学本身就是一种叶茂枝繁、精深博大的独立体系。但古代末至近代初基督教一家独大,过于强势,不独普罗提诺,其他古代思想家都没能受到应有的注意;启蒙运动以降,西方思想开始呈多元样态,普罗提诺思想本身才受到一定的关注。但随之问题也来了:工业革命后尤其是19世纪末以降,现代知识生产方式发生了至深至巨的变化,学科化、专业化、“客观化”的知识生产体系迅速占据主导地位,古代那种论家造论传道,思想以其本身魅力而传播的“知识”生产方式迅速式微。于是普罗提诺思想面临着威胁:在新知识体系中沦为一个毫无生气的哲学“研究”对象,而非如所期冀的,作为一种活泼泼的生命学问,把黑暗中的人们引上一条朗朗光照的康庄大道,领入一种祥和宁静又充满激情的生命实践。普罗提诺思想的根本目的,不就是要使他自己乃至芸芸众生的灵魂通过元智与太一合而为一?

甚至晚至20世纪,普罗提诺思想仍以其固有魅力收获了一个近乎门徒的拥趸,他就是斯蒂芬·麦肯那。谁能说只有基督教之类的“科班”宗

教才能广播福音，广收灵魂？麦肯那不是“科班”学者，甚至连大学也没考上，似乎注定不能在现代学术体制中占一席之地。然而在冥冥中，他的魂似乎早就被普罗提诺勾去，故而在诺大的英语世界，竟然是体制外的他成为《九章集》的最重要译者。A. H. 阿姆斯特朗之类的体制内学者字对字、句对句翻译了《九章集》，较为忠实地传达出原文的字面意思，自然功劳不小，但是麦肯那那词采飞扬、看似天马行空的译文却更准确地传达了普罗提诺思想作为一种生命形上学的精神实质。麦肯那一生不说穷困潦倒，至少时常生计窘迫。纯粹是靠着对人文学的酷爱和对语言美的悟性，再加刻苦坚持与伯·塞·佩吉的协助，他才全译了这部词藻优美、难度极大的古书。为此他付出了健康的代价，六十来岁便辞世而去，没有子嗣。然逝者的生命在麦译《九章集》中延续——该译本及修订本已有数十个版本流传。这样的成就，体制内学者可望而不可及。普罗提诺有麦肯那这样的拥趸、译者和阐释者，是幸运的。

现在，普罗提诺到汉语世界来收拥趸了。不幸或者说幸运的是，这里又有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分。在体制内的哲学、宗教学从业者中，普罗提诺固然已有不少追随者，但是他真正意义上的拥趸，恐怕还得到《九章集》的译者中找寻。这里特别要提到的，自然是本书译者应明和崔峰。二位都未受过哲学宗教学科班训练，却在两三年时间里完成了《九章集》全译这一壮举。没有心无旁骛的定力，没有异乎寻常的刻苦精神，这是不可能的事。尤其可能让体制内学者感到诧异的是，二位不仅置身体制之外，而且译出如此一部难度极大的古书，竟得不到什么实际好处。姑不论微薄的稿酬决非巨大的劳动所值，众所周知在现行学术体制里，翻译作品不算“创新”，不算“成果”。对于就职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非哲学专业的崔峰来说，译《九章集》即使不能说全无意义，至少意义不大。对于主译应明来说，《九章集》的翻译更完全是打义工。她似乎跟作为学科的哲学、宗教学毫不搭界，连大学教师也不是，甚至不打算成为大学教师。然而在翻译过程中，她除了海量阅读专业学者所必读的哲学和古典学文献，费尽心力

地遣词造句,呕心沥血地甄选译名,更花了大量时间精力自费奔波于欧美图书馆搜索、查阅和复印相关资料。对于体制内学者来说,若不是要读一个相关学位,若没有申请到诸如国家社科基金或教育部留学基金等的经费,这么做是没法想象的,甚至是完全没有意义的。这一切如何是可能的呢?除了译者的悟性、学养和《九章集》本身的魅力,似乎没有更好的解释。总之,汉语世界有应明这样的译者,普罗提诺又是幸运的。

关于版本的说明

本汉译本主体据麦肯那译《九章集》1969年第四版翻译,部分内容据阿姆斯特朗《九章集》译本译出。重要术语的翻译参考了阿译《九章集》所附希腊文原文。

关于三个关键术语译名的说明

由于汉语中“太一”完美地对应了 Henos 或 the One,译者虽曾一度倾向于用“元一”翻译,但最后决定不浪费既有术语资源,徒增读者的负担,仍用“太一”。Nous,即麦肯那译为 Intellectual Principle, principle of Intellection 者,因既有的汉译如“理智”、“心智”、“心灵”、“心识”、“努斯”等都未能传达出原文的本原、根本、根源、万物之本等义,故而用“元智”翻译。Psyche 或 Psyche holes,即麦肯那译为 the All-Soul 者,现有汉译“灵魂”因同样未能表达出原文的本原、根本、根源、万物之本等义,故用“元魂”(“大全灵魂”)翻译。

关于分工的说明

本书前三卷译者为应明,后三卷为崔峰。术语的确定和统一,正文以外的介绍性文字和附录由应明负责。此外,应明协助搜索并确定了版本,承担了大部分审阅、校改工作。

2016年11月3日于深圳南山悠然天地

译 序

西方思想史上的隐身大师¹

应 明

1

如果说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在为柏拉图(427BCE - 347BCE)作注,那么晚期希腊哲学家普罗提诺(205—270)大概是最有意思的作注人。他当日便深信柏拉图早已洞悉真理,只是有些地方没讲透而造成六百年来众说纷纭。于是,他细察各派教义,按照他的理解整合出一个“柏拉图体系”,²在差不多知天命之年时动笔著述。十六七年间写下的这些

¹ 便于讨论起见,我在本文和为本书做的脚注中,权且沿用目前西方人对“西方”这个文化概念的界定,认为它包含两大成分,即源自希腊的追求知识的哲学和脱胎于犹太人一神信仰的基督教。后者怎么指称,也做个统一:或称基督教,或在有必要指出传承时称“犹太—基督教”。“希伯来人”、“希伯来信仰”的提法当然可以,但为了避免混乱,不用了。只在涉及犹太人语言时提“希伯来语”,或在不会引起歧义之处用“两希”简称西方文化或思想的两大成分。

² 柏拉图没有体系,只有一个个在发展、深化的问题。柏拉图长寿,写作生涯也长,他的早、中、晚期思想变化大,无法视之为体系。国内已有学者注意到,如张映伟在他的《普罗提诺论恶》中说,他的导师靳希平提过。那么,何妨跟国际接轨,避免把“体系”一词缀在“柏拉图(哲学或理论、思想)”之后呢?普罗提诺提炼的“柏拉图体系”,今天被视作普罗提诺体系。(转下页)

文字,后来由弟子波菲利(233—305)编辑成六卷,每卷九章,总题为《九章集》。

伟大的作品很像天资非凡的孩子,任父母用尽一片心把自己的意愿灌输给他,他还是会出息成父母无法想像的模样。《九章集》也不例外。以柏拉图的阐释者、捍卫者自居的普罗提诺倘真天上有灵,得知他的思想居然催生了拉丁教父奥古斯丁(354—430)³,参与奠定他根本没看上眼的基督教的神学理论基础,并且,主要因为与基督教结下难解之缘而流传千古,恐怕不得不慨叹,“作者已死”。

但有一点普罗提诺应该很欣慰——作为柏拉图的作注人,还有谁享有过长达一千五百余年的权威呢?奥古斯丁盛赞他是“世上最懂柏拉图的人”。⁴在古典作品湮没不闻的中世纪(5或6世纪—14或15世纪)拉丁世界,神哲学家们,包括基督教思想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只能借道奥古斯丁等早期教父来吸收柏拉图哲学,所以很自然地奉普罗提诺及其传人为正统柏拉图主义者。⁵稍后,“全部密契主义运动最伟大的人物”埃克哈特(1260—1327),不仅以托马斯体系作为其形而上学的基础,也从其他渠道引入了普罗提诺的密契主义因素。⁶墙

(接上页)他是如何体系化的呢?只取柏拉图晚期作品的部分章节,拿来时又常常无视原文语境。实际上,就表述形式来看,二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有无体系,参见 A. H. Armstrong, *Plotinus*, Collier Books, 1962, p. 20。

³ 奥古斯丁《忏悔录》7卷回忆了新柏拉图主义对他的影响。他由此彻底摆脱唯物主义,解决了善恶观,但在拯救力量来源等根本问题上还是转向了基督教。《忏悔录》8卷2章提到他读的“柏拉图主义作品”——其实是普罗提诺、波菲利的作品——是维克托里努斯译入拉丁语的,该译本于6世纪失传。

⁴ 引自奥古斯丁《神之城》9卷10章。便于比较起见,本书中的“god”统一译作“神”。

⁵ 托马斯·阿奎那的公认功绩是把亚里士多德引入基督教。但保罗·亨利称,阿奎那受到的新柏拉图主义影响要比他本人意识到的大;他还提到前人更激进的说法——阿奎那更亲近普罗提诺,而不是亚里士多德,参见 Paul Henry, “The Place of Plotinus in the History of Thought”, in *Enneads*, ed. by John Dillon, Penguin group, 1991, pp. xliii - xliv。我解释一下,亚里士多德在中世纪的黑暗来到之前就被忘掉了,而普罗提诺的柏拉图已潜入基督教。阿奎那引进亚里士多德是创举,为使亚氏可为基督教所用,必加以改造。而经奥古斯丁改造好的普罗提诺已与基督教磨合近千年,他之于阿奎那是家里人。

⁶ 引自梯利著,葛力译,《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2005, p. 242。

内开花墙外香。差不多同历史时期,在东罗马,或曰拜占庭帝国,有不少人冒着宗教迫害的危险传抄《九章集》;在阿拉伯世界,《九章集》后三卷被冠名为“希腊哲人”的作品辗转流传,启发了至今仍在发挥影响力的伊斯兰教苏菲主义;而散居的犹太人也间接吸纳了经普罗提诺阐释的柏拉图主义。⁷ 及至文艺复兴时期(14或15世纪—17世纪),重开柏拉图学园、再次把《九章集》跟柏拉图作品一起译入拉丁语的非奇诺(1433—1499)不仅沿袭普罗提诺的柏拉图解读法,还力图使这套哲学与基督教、与当时的人本主义思潮兼容。他还造了一个广为人知甚至飘洋过海在汉语中都扎下根的词“柏拉图式的爱”⁸,今天仔细一看,分明是普罗提诺式的爱。可是,了不起的非奇诺成功地让全欧洲都接受了他的主张,“柏拉图本人是通过普罗提诺开口的”⁹。受他影响,17世纪兴起的剑桥柏拉图主义,仍然披着普罗提诺的外衣。总之,毫不夸张地说,西方思想史泰半时间是通

7 普罗提诺由于其后继者的传布之功而影响到拜占庭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哲学诞生,参见 Dominic J. O'Meara, *Plotinu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Ennea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12-114。中世纪最伟大的犹太思想家摩西·迈蒙尼德(1135—1204)又通过阿拉伯语文献接触到普罗提诺的思想。“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神学传统,各在其成型期向古希腊哲学求教过语言、论证……都认为柏拉图主义表达的哲学最接近他们各自的神学。普罗提诺则是他们理解柏拉图主义的主要源头”,引自 Lloyd P. Gerson 做的词条 <http://plato.stanford.edu/entries/plotinus/#5>。按照译序脚注1的界定,普罗提诺的影响已越出西方。但目前跨文化的研究比较有限,只能点到即止。

8 参见 Marsilio Ficino, *Commentary on Plato's Symposium on Love*, English trans. by Sears Jayne, Spring Publications, 1983。非奇诺以“爱”来会通(新)柏拉图哲学和基督教,颇得要领。如果说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未尝不可说普罗提诺哲学是“爱的哲学”。希腊语词“爱(Eros)”的词源即“看(Horasis)”,这连接主客体的“看”就是观照、观想,参见Ⅲ.5.3。观想是普罗提诺密契主义修行之道,也是其形而上学体系的关键(参见第三卷第八章脚注15、18),创造之秘密在于观想(Ⅱ.3.18,参见第二卷第四章脚注13),福乐亦维系于观想(参见第一卷第五章脚注15),因而生活之本质内容无非观想(参见《生平》脚注29)。不过,关于“爱”,柏拉图和普罗提诺理解有别,参见《生平》脚注49,第三卷第五章脚注7。希腊哲学和基督教也理解有别,参见第三卷第五章脚注50,第三卷第五章脚注51。

9 转引自 Lloyd P. Gerson, “Introduction”, in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otinus*, ed. by Lloyd P. Ger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22。

过普罗提诺的眼睛来看柏拉图的。¹⁰

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浪漫主义兴起之时,也是现代意义上的古典学兴起之时,才有德国学者最先意识到,普罗提诺恐怕并非接近柏拉图的不二法门。诚如他本人所言,他的教义不是新发明,¹¹但是,他在异质文化首次大碰撞的新历史语境中,带着新问题,通过一个新体系全面总结了他所继承的传统,重构了一个富于他那个时代精神的柏拉图。¹²波菲利早已认识到,他的老师“走他自己的路,不因袭成说”,¹³然而,直到一千五百余年之后,人们才看清楚他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有必要为他另立门户,“新柏拉图主义”。

事实上,人们在恍然大悟之际用出这个名号,是带点讥诮味的。但晚近两个世纪以来,随着对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以及二者之间传承、包容关系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新柏拉图主义”已经成为一个认真的称呼。当然,登堂入室者会斥它是个“没什么用”,甚至“被滥用”的标签。¹⁴可话说回来,所有的哲学标签都是门口不得不挂的一块牌子,又有用,又没用,又容易被滥用。必得其门而入,方见宗庙之美。

2

的确,新柏拉图主义“新”在何处,不是三言两语能讲清楚的。这里仅集中谈一个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区别性特征——现代哲学标签谓之为

¹⁰ 原话参见 John Dillon, Lloyd P. Gerson, *Neoplatonic Philosophy: Introductory Reading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Inc., 2004, p. xxii.

¹¹ 原话参见 V. 1. 8。不过,不要被该处举的例子——“思与在同一”要追溯到巴门尼德和柏拉图——误导了,参见译序脚注 28。

¹² 参见 Pierre Hadot, *Plotinus or The Simplicity of Vision*, English trans. by Michael Chas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 2,“是在努力调和、系统化的过程中,(普罗提诺的)个人创造性发挥了作用”。

¹³ 引自《生平》14 节。

¹⁴ 引自 Lloyd Gerson, “Introduction”,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otinus*, ed. by Lloyd Ger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

“主体性”。¹⁵ 且以国内学界提起柏拉图就不能不想到的“观念”¹⁶作为话头。波菲利也正是在这个本体论问题上站稳立场,交了份合格的投名状才取得承衣钵弟子的资格。¹⁷ 说来奇怪,照今天的看法,波菲利原先的见解才是真正的柏拉图——观念是高于理性的智觉所把握的原型,是绝对外在于主体的实在。¹⁸ 在这个为我们感官所感觉的物质世界,万物方生

¹⁵ 普罗提诺研究者多用“生命意识”、“精神自主”来描述这种区别。我选择“主体性”,并以它作为本文的一条主线,原因是它不仅表达了类似含义,还能串起新柏拉图主义与柏拉图主义,希腊哲学与犹太—基督教,乃至所谓的西方与东方,古代与现代,最大限度地提供我这样一个 21 世纪的中国人所感兴趣的整个文化图景。“主体性”是笛卡尔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概念,本文仅在如下意义上使用它:注重作为主体的人的生命体验和心智认识,关心人的本质,推崇人的精神自主。特别要提出,如果本文 1、2 两节考据站得住脚,也就是说,为柏拉图代言一千五百余年的普罗提诺是讲生命意识,讲精神自主的,那么,西方整个哲学传统就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理性至上,二元对立等等后现代论断,我们拿来时要谨慎对待。

参见 Sara Rappe, “Self-knowledge and Subjectivity in the Enneads”, in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lotinus*, ed. by Lloyd P. Ger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250–274。该文从“作为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入手,也认为波菲利的问题是理解主体性的难点。

¹⁶ 这个概念对应的希腊语词“eidos”派生自动词“idein”(观看),荷马用它指肉眼看到的外观。柏拉图在比喻意义上指灵魂之眼看到的实在,即某类事物的抽象原型。它的汉译有争议。“理念”? 陈康已指出,柏拉图不讲“理”;我想补充的是,“理念”的一度流行应该和冯友兰新理学的兴盛有关。陈康提出的“相”,有观看的含义,还让人联想到佛教概念“实相”,是个好译法。但他批评“念”偏重意识,我不是很明白。“念”从心,不是很准确吗? 它和哲学味很浓的“观”字构成“观念”,来译“eidos”,我认为也是个备选。把握“eidos”的看,希腊语词是“theoria”,一般译作“观照”,我也译作“观想”。“观念”可以和它建立有助于理解的联系。又有人顾虑现代哲学中的“观念”会与此混淆。不错,如笛卡尔的“观念”可指不实在的图像,但他用这个词不正是因为想到希腊语词“eidos”,想与柏拉图对话吗? 若现代哲学称“观念”,老祖宗的说法恰恰不必他求。换过来想,朱熹讲的“理”、“气”,跟诸子讲的有质的不同,我们会担心混淆而另想字眼吗?

¹⁷ 波菲利引起的讨论,即可智知物是否在元智之外,参见《生平》18 节。普罗提诺正面论述参见 III. 8. 8,反面驳斥参见 II. 9. 6、III. 9. 1 和 V. 5. 1 等处。频频反驳恰说明他的理解本非主流意见。当代看法是,波菲利起先从隆癸诺斯那里继承的看法更接近柏拉图本意,参见 John M. Rist, *Plotinus: The Road to Re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 172。

¹⁸ “智觉”译的是“intellect”,对应的希腊语词是“nous”。在柏拉图那里,认知能力分为三级,最低级的是感官知觉,较高级的是理性推导,最高级的就是直觉顿悟,即智觉。参见《理想国》VII. 507b–c,“……观念是智觉到的(intellected),而非肉眼看到的(seen)”。柏拉图对观念世界和感觉世界的探讨,比较集中地见于《斐多》、《斐德若》、《理想国》和《提迈欧》。值得注意的是,引发后世科学革命的希腊理性思维方式,在希腊哲学家眼里是居直觉顿悟之下的。苏格拉底干脆说,神秘主义者——神秘主义,或曰密契主义的核心含义是人神合一的体验——(转下页)

方死，方可方不可。而在那个惟智觉，或曰灵魂之眼，才能一睹的精神世界，观念永恒不易；你见或者不见，它都在那里，不生不灭，不增不减。所以说，柏拉图是比较典型的客观唯心主义者。与此不同，普罗提诺不是把观念本身，却是把正在照察观念的智觉立为神圣本原。用他本人的话下一个定义，元智“是现实的，也是永恒智力”。或者顺着柏拉图的灵魂之眼譬喻，不妨这么说，“元智是一种视觉，本身在看的视觉；因此它是一种已实际生效的潜能”。¹⁹ 可见，他引入了意识主体，但他又不是信奉唯识无境或者存在就是被感知的主观唯心主义者。因为，他不否认客体对象的真实性。他想说的是什么呢？简言之，主客体同一。智觉这个神圣本原是超越多样性，超越二元对立的。还是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在元智自己身上，认识者和被认识者是完全同一的”。“它(元智)与它的对象同在，与后者同一，构成一个统一体。”²⁰ 于是，道存目击，“当它(即智觉)观看本真存在(即观念)时，它就在观看它自己”。修行则需内观，需唤起“内在视力”，“退守你自身，再看”。²¹ 那么，这个超越了主客对立的统一体，是不是另一种独立于人的绝对存在呢？²² 普罗提诺会说，是；但又不是，因为

(接上页)才是真正的哲学家，参见《斐多》69d。也就是说，智觉顿悟、人神合一等思想，普罗提诺是谈得比柏拉图多很多，但完全不能算“给柏拉图主义注入的新内容”，参见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pp. 97-98。这种看似颇具东方色彩的成分，在前苏格拉底时代很常见。当然，不同时期文化间交流也是可能的。

¹⁹ 引自 V. 9. 5 和 III. 8. 11。前句中“现实”和“永恒”怎么理解，参见 II. 5 和 III. 7。“元智”即“智觉本原”，参见《关于术语体系的说明》注 9。

²⁰ 引自 III. 8. 8 和 V. 4. 2。V. 3. 5 亦有类似表述。后句引文处，迪注指出，普罗提诺用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智觉与其对象同一的法则。阿译本 V. 5 提要则指出，该篇前三节有力论证了智觉与其对象——可智知物，或曰观念、形式——的“绝对同一”。

²¹ 引自 V. 3. 6 和 I. 6. 9。普罗提诺接过了柏拉图的灵魂之眼比喻，取的含义是智觉把握对象无需推理，是顿悟的；但他剔除了客体外在于主体这层含义，有专门解释，“感受力处理的可感对象是独立于感觉而存在的，而元智识别事物不是这样的：相反，它实际上就是它所认识的事物”，引自 V. 4. 2。

²² 后世的德国古典哲学家谢林、黑格尔等人会说，是。所以，他们仍可被划入客观唯心主义阵营。而此处分析表明，主、客观唯心主义的标签，对于普罗提诺是失效的。不过，从历史上看，普罗提诺容易被误解成主观主义者。